



夏斌 经济学家做什么？

经济学家夏斌现在的官方头衔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上周，他在一次演说中，代表经济学家给经济学家提了要求。下面是演讲摘录：

我认为有三类经济学家：第一、理论经济学家，目标就是要摘取诺贝尔奖，就是提出问题，进行规律发现。第二、应用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研究中国转轨，研究中国制度变革，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他的主要内容是短期政治、长期政治的演变和制度的转型。第三、分析常识的经济学家，比如我们看到一些书摊摆的书，他们在普及经济知识。这三类经济学家我们都需要，没有高低之分。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1. 研究中国加快制度转型；2. 总结中国有没有理论规律。完成这两大使命，第一

我觉得应该好好学习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这对我来说我一直很关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小国开放，我们是大国开放，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今天一举一动对世界政治制度的演变都有影响。

第二我的建议是应该读点经济学术史，我们不要简单地迷信，我们要尊重先人、前辈、西方伟大的经济学家，我们要尊重他们，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信前辈，更不要简单地在中国转轨这样一个长历史时期简单地迷信主流经济学。

经济学人应该是良心守望者，知识的守望者，不能敷衍趋势，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见风使舵。（有些经济学人）经常是今天否定自己的昨天，今年否定自己的去年，不断地打自己的耳光，这样的经济学人是没有出息的。

朱兴良 首富的疑罪



原本，朱兴良是准备去沈阳参加一个协会会议的，但最后他的身影没有出现在会场。消息随后就传了出来：朱被有关部门带走了。

人生如戏，今年5月上市公司金螳螂的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家族以189亿元身家荣膺江苏首富，而现在，却滑向了人生的另一端。

据说，朱兴良平时沉默寡言，为人低调。20年前，金螳螂成立，起初只有20多名员工，办公条件也颇为简陋，历经挣扎得以生存。

在第二年，金螳螂就在江苏省会城市南京开了第二家分公司，到1996年，金螳螂又在毗邻苏州的上海市开了分公司，这才逐渐走向了全国。

此后金螳螂发展的重要节点出现在1999年，这一年金螳螂不仅获得了苏州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建筑业的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鲁班奖，同时它还实施了一项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举措——管理层持股。

这给朱兴良的放权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03年10月，朱兴良从公司董事长任上离职，倪林接任。

朱兴良是苏州本地人，消息人士透露，朱跟官员走得很近。由于长袖善舞加上为人实在，他这些年积累了不少人脉，金螳螂频频接到大单，包括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首都博物馆、通用中国总部大楼、世界佛教大会主会场无锡灵山胜境梵宫、苏州博物馆和北京希尔顿酒店等几十家五星级大酒店，这些建筑几乎囊括了大型公共建筑的各个领域。

虽然现在在官方层面，并没有给出太多有关朱兴良的消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与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有关。

看来，近期社会言论中有关商人“在商言商”的讨论多少带着点书呆子气。就像王功权解构的那样：“在商言商”包括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不与特权合谋；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作出业务牺牲。朱兴良的例子再一次证明，很少有商人能做到到这几条。

张跃 天空之城造梦者



张跃站出来说了，长沙的天空之城手续并没有不齐全。

这个天空之城不得了。按照张跃的计划，这座长沙“世界第一高楼”高838米，造价90亿，按初步的设想6-15层为写字楼，16-170层分别为小公寓、中档公寓、高档公寓，酒店位于171-202层，拥有多所学校、一所医院、17个直升机起降场，能容纳约3万人。

并且，张跃计划这座838米的高楼在10个月内封顶。

这是神一样的速度，神一样的速度。

其实，之所以要建“天空之城”，源于张跃的环保梦想。早在好几年前，他就在各大论坛痛陈“大城市病”——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还跟任志强直接争论。所以他现在要通过盖高楼节约能源、减少拥挤和污染、净化脏空气，给人类提供更加健康的场所。张跃坚信这座“天空之城大楼”是地球土地紧缺、人口过多、污染及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方案。

同时，还因为他有个向往天空的梦想。张跃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私人公务机和直升机的人。1998年，远大就购买了一架约900万美元的“奖状EXCEL”10座喷气公务机和一架约300万美元的“贝尔427”8座直升机，也就在这一年，张跃还考取了中国第一个直升机私人驾照。这两架飞机至今仍在用；1999年，远大又购买了3架十几万美元的教练机。眼下，远大已经有一个机队了，总价值2亿多元。

看起来，远大的“天空”情怀仍然可以继续。

任正非 加薪指挥官



这确实诱人。在一片毕业就业难的舆论中，任正非突然准备给华为的子弟兵们加薪10亿，其中大学毕业生起薪将达到1万元。

事实上这一次加薪并非没有预兆。在6月27日，任正非的内部讲话其实就有暗示。

他说：“我不眼红年轻人拿高工资，贡献很大才能拿到这么高的工资，我们还要进一步推行这种新的薪酬改革。前二十几年我们已经熬过了不平坦的道路，走上新道路时，就要新条件。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就是我们未来的期望。这样改变以后，华为将一枝独秀。”

说白了，就是给能干活的人多一些钱，激励他们干更多的活。这就是华为的秘密——“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

早在1990年代，中国开始走向市场化的同时，任正非用“利益”驱动手下那批贪婪的“饿狼”。

而他能驾驭他们，却是因为他不贪。这跟任正非极为困苦的经验有关。他回忆，年轻时家里的粮食必须严格配给，“否则就有一两个弟妹活不下来”，家里穷到没有任何一个有锁的柜子，任正非的父母严格控制自己的欲望，在繁重的工作下，却不多吃一口粮食，任正非考大学之前，饿得受不了，只有把菜混合一点米糠，烙着吃，就是不能动弟妹妹的伙食。任正非回忆：“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和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这让任正非大量分利给员工。即使华为成为营收千亿元级的大企业，他仍是自己买车，自己开车，不用公司的钱请司机，甚至和员工一起在员工食堂用餐。

高度危机意识与自制，养成了任正非的理性特质。